

历史舞台上的关公戏

赵山理 周长春

在群星灿烂的历史天空中,关公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关公,名羽,字云长,出生于东汉末年河东解县。千百年来,关公以其忠且赤诚、勇而笃义的人格风范,获得正统的推崇,赢得民间的敬仰,又经过历代民间艺人、小说家、戏剧家的不断美化、神化、圣化,早已由一位历史人物,升格为中华民族的一尊道德偶像,成为与“文圣人”孔子并肩的“武圣人”,构成了民间信仰的两座道德高峰。这一文化现象,反映到中国戏剧舞台上,就是蔚为大观的关公戏。

关公形象最早出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其最初的表演形式并非真人扮演的戏剧,而是皮影戏(影戏)和民间说书。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笔记中提到,市井中有“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的艺人。这是关公形象从史书文本进入通俗表演艺术的开端。到了元代,关公成为元杂剧的重要角色,出现了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十余部以关公为主角的剧本。这标志着关公形象在成熟的戏剧舞台上正式确立,关公戏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演出盛况。在明代,关公戏剧本创作更加丰富,演出范围从民间扩大到宫廷。进入清代,关公戏的演出达到鼎盛,表演程式、脸谱、服装日益精致。清代中后期至今,京剧及各类地方戏形成了完整的“红生”表演体系,关公

的臉譜、功架、唱腔等舞台形象最终定型,代表性的艺术家层出不穷,影响全国。关公戏,又称“红生戏”。关公角色属于特殊的“红生”行当,介于老生、武生之间,兼具文武气质。脸上勾红脸谱,表示忠勇耿直,眉眼角画“丹凤眼、卧蚕眉”,凸显其威严与神性。造型为头戴绿盔或扎绿色巾,身着绿袍,绿色象征关公忠诚的品格;黑色或髯色长髯飘逸潇洒,手持青龙偃月刀,舞台形象高大威武。表演功架沉稳,动作庄重凝练,步伐稳健,儒雅肃穆,避免轻浮夸张。唱念嗓音高亢浑厚,念白铿锵有力,常用“膛音”“虎音”增强气势。传统演出中,扮演关公的演员在上妆前需斋戒沐浴,上妆后在后台和台上不能与人随便交谈,其他人需尊称其为“关老爷”等,以示尊敬。这些规矩如今虽已简化,但在许多老戏班和传统氛围浓厚的地方仍被重视。

关公戏多为“三国戏”中的重要篇章,涵盖关公生平关键事件。《桃园三结义》,与刘备、张飞结义,奠定其忠义起点。《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展现其勇武。《屯土山》《白马坡》《诛文丑》《蒲桥挑袍》《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这几出戏连贯起来,完整塑造了关公既报曹操之恩,又守兄弟之约“忠义两全”的经典形象。《古城会》,斩蔡阳,兄弟释疑。《战长沙》,展现了关公从“勇将”到“帅才”的成长。《汉津口》,以“气势”和“场面”取胜,突出关公作为一方统帅的“大局作用”和不可替代的支柱价值。《华容道》,演绎关公“义释曹操”的复杂人性。《单刀会》,是赞颂关公晚年镇守荆州智勇双全的经典,尤以元杂剧《关大王单刀赴会》著名。《水淹七军》,既表现关公威震华夏的一面,也暗藏骄兵兵失荆州的伏笔。《走麦城》,又名《败走麦城》或《白衣渡江》,是关公戏的终章,也是一部极为特殊、凝重且震撼人心的悲剧杰作,但因表现英雄末路,演出即祭祀,不仅需焚香祭拜,而且从开演到结束台上台下都需保持极度肃穆、凝重的气氛。

关公戏成为京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因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自成一家。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以演关公戏闻名的大师,他们承前启后,共同构建了京剧关公戏的艺术体系。清代中后期,米喜子的表演奠定了关公“神化”而非“人化”的基调,有“戏佛”之称,被公认为京剧关公戏奠基人。程长庚继承并发展了米喜子的关公戏,在当时亦被视为典范。清末民初,王鸿寿将关公戏从老生或武生行当中彻底独立出来,是京剧“红生”行当的真正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被

称为“红生泰斗”。民国之后,李洪春作为王鸿寿最杰出的传人,全面继承了王的艺术,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是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被誉为“活关公”“关剧宗师”。王派传人还有李万春、林树森、王金璐、袁金凯、曹艺斌、宋遇春、李金声、周信芳、李吉来、高盛麟、奚中路等。概言其发展传承脉络,米喜子奠基,程长庚承袭,王鸿寿集大成并创立红生行当,李洪春全面传承与体系化并繁衍出“南林北李”(林树森、李万春)、周信芳、高盛麟等各具特色的大家,直至今日仍有传人活跃于舞台。这些名家共同铸就了京剧关公戏这座艺术丰碑。

蒲剧是关公的“家乡戏”,流传盛行于晋陕豫运城、临汾、三门峡、渭南以及西安等地区。蒲剧中的关公戏,堪称中国戏曲史上最古老、最质朴、最具地域信仰色彩的关公表演艺术。蒲剧舞台上的关公,不仅是艺术形象,更是家乡圣贤的神灵化身,演出常与庙会、祭祀、祈福等民间活动紧密结合,带有极强的仪式感和庄严感。表演风格突出关公的神勇威猛和大义凛然,粗犷豪放,古朴悲壮;动作大开大合,唱腔高亢激越,用蒲剧特有的“慷慨之音”来表现关公的忠勇与悲情。艺术特点上,蒲剧关公戏的髯口功、鞭策功和“摆剑”程式独具特色。蒲剧秦腔韵味独特,关公戏威风凛凛,塑造深刻。艺名“十三红”的张庆奎功底扎实,表演浑厚大气,是蒲剧关公戏的重要传承者。当代,仍有许多优秀演员致力于传承这一独特艺术。每年金秋时节,在解州关帝庙崇宁大殿前,都要连续数日上演《古城会》等关公戏。山西省蒲剧艺术院编排演出的《关公颂》,把蒲剧艺术与民族交响乐融合在一起,由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参演,再现关公从桃园结义到威震华夏的一生,现京演出轰动京城,现已成为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保留节目。蒲剧关公戏的宝贵价值,在于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关公形象从民间信仰走向舞台艺术的原始风貌,是研究关公文化、戏曲起源与流变的“活化石”。

几乎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有搬演关公戏的传统。山西的晋剧(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都有丰富的关公戏。秦腔的关公戏表演风格高亢激越,充满豪侠之气。豫剧作为河南及中原地区的最大剧种,也有《关公挑袍》《古城会》等经典。河北梆子与京剧渊源深,关公戏也颇盛行。北方昆曲作为“百戏之祖”,也有《单刀会》等极其经典、文学性与表演性俱佳的折子戏,唱词慷慨激昂。在南方地区,湖北的主要剧种汉剧对京剧形成影响巨大,其关公戏传统深厚。徽剧是京剧的主要源头之一,王鸿寿的关公戏就吸收了徽剧的艺术特点。川剧的关公戏有特色,注重变脸、吐火等特技的运用(多用于表现关公身边的周仓等角色)。浙江绍兴的绍剧,表演风格粗犷豪放,擅演关公戏。粤剧流行于广东及港澳地区,早期也有“红生”行当,演出《华容道》等剧目。湘剧、祁剧、辰河戏等湖南地方大戏,关公戏也是重要题材。滇剧受京剧、川剧影响,也有关公戏。南昆与北昆一样,有《单刀会》等经典。浙江金华婺剧,高腔部分演关公戏很有特色。全国各地皮影和木偶戏班也常演关公戏。

关公戏,在中华戏曲中具有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它超越了普通的历史故事题材,融合了艺术、信仰和民俗,千年传承,赓续绵延,历久弥新,至今仍仍在舞台上焕发着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戏曲文化中一道独具特色的景观。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题材,关公戏以其塑造的关公“忠、义、仁、勇”形象深入人心,在历史上发挥了显著的“高台教化”作用。关公戏所体现的传统美德,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今天关公戏仍在上演,其教化内涵亦随时代演进,从维护封建伦理,转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这一转向的本身,即是中国戏曲本身“文以载道”传统的生动体现,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和艺术奇葩的馨香。

千年古建耀三晋

——“纵览宝藏山西 品鉴古建风华”专题讲座特写

本报记者 游映霞

地上五千年看山西。看的究竟是什么?怎样的文脉,让这片土地风华不减?

“《黑神话:悟空》带火山西,绝非偶然,而是三晋大地沉淀千年文化能量的集中释放。”4月11日,运城博物馆“纵览宝藏山西 品鉴古建风华”专题讲座举办,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毅敏精彩开讲。

讲座立足山西丰富的文物遗存,以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讲解,全方位梳理山西古建筑的历史脉络、艺术价值与保护传承理念,生动阐释“地上文物看山西”的深刻内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三晋古建的魅力。

山西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活态博物馆,遗存数量多、时代跨度大、类型齐全、技艺精湛,在全国独一无二。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一座座古建跨越千年,不仅承载着营造技艺与艺术审美,更记录着一方水土的人文精神与民族情感。

讲座中,任毅敏逐一介绍山西标

志性古建:全国现存8座辽代木构建筑,山西就有3座——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其中应县木塔是世界现存最早、最高的纯木构楼阁式塔,双套筒结构暗藏古代力学智慧,梁思成曾赞叹:“不见此塔,不知木构之可能性。”

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七彩琉璃塔,元代重建后历经地震依然屹立;解州关帝庙中轴线为武庙之冠最高规制,彰显着中华忠义文化;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体量宏大,一殿汇集辽、金、明、清四朝营造精华,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露齿菩萨”姿态传神,被称作“东方最美菩萨”;善化寺则是国内辽金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处,唐风犹存,气势雄浑。悬空寺建于峭壁之间,一木一梁皆显奇绝,都是独一无二的国之瑰宝……

线上直播间同步开讲,3000余人次远程“云听课”,直播间点赞不断,三晋古建的魅力跨越地域,打动了更多人。

讲座介绍了中国建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忻州市佛光寺的发现。

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根据敦煌壁画线索寻访至五台山,在条件艰苦的殿内细致勘察。林徽因在梁架上辨认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墨书题记,结合石经幢铭文,最终确认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木构建筑。这一发现,打破了“中国无唐代木构”的论断,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宝”,重新书写了中国建筑史。

除了古建,山西的彩塑与壁画同样冠绝全国。全省现存彩塑超12000尊,全国仅存的3处唐代观形彩塑都在山西;壁画总面积超5万平方米,从北齐到元代,绵延千年,体系完整。永乐宫壁画是元代壁画巅峰之作,上世纪60年代,文保工作者耗时近十年完成其整体搬迁,成为文物保护的一段佳话。隰县小西天的明代悬塑被誉为“明代彩塑绝唱”,仙官佛国栩栩如生,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向往与文化情怀。

“早在明代,长治观音堂的彩塑中

市文化馆公开征集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团队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工作要求,近日,市文化馆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主动创新服务模式,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团队,进一步夯实基层群众文化根基,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与实效性。

基层群众文化团队是繁荣群众文化、传递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载体。本次征集工作旨在发掘一批常年活跃在公园、社区、广场等基层一线,拥有固定成员、固定场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的群众文艺队伍,通过精准选拔、重点培育,打造示范性、影响力广的基层文艺标杆团队,为其提供全方位文化扶持,推动全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据悉,本次拟征集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团队共3支,申报团队需同时满足团队规模、活动常态、场所固定、内容健康、群众基础、团队稳定六大条件,要求团队固定成员达30人以

上,具备完善管理架构与明确负责人,成立时间不少于1年,每周至少开展1次集中排练或活动,年度活动不少于10场,活动内容积极向上,彰显河东地域文化特色,且在基层拥有良好群众口碑与影响力。

为助力入选团队高质量发展,运城市文化馆将推出五大扶持举措,安排专业艺术骨干提供针对性文艺辅导,将团队优先纳入文化志愿者服务体系、支持参与各类文化惠民演出,在场地使用、设备借用、活动经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优先推荐团队参与省市级群众文化展演、赛事及文艺交流活动,同时协助团队打磨精品节目,打造独具河东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全方位激发基层群众文化活力。

此次征集申报时间为即日起至4月30日,申报团队须提交团队简介、活动照片、负责人身份证明及相关佐证材料,通过微信报送至运城市文化馆培训部。后续,市文化馆将严格审核资格初审、实地考察、结果公示的流程开展评审工作,评审结果将在该馆微信公众号公示,确保征集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4月10日,闻喜县群星爱乐合唱团“文化惠民演出下基层”活动走进闻喜县西官庄村,将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欣赏到专业精彩的文艺表演,进一步拉近了文化与群众的距离。特约摄影 杨秀文 温徐旺 摄影报道

“河东文丛”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东文丛”出版发行。

“河东文丛”共分五册,计155万字,描绘了河东的独特魅力,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时代变迁。

其中李文晓著的《家在山河间》,以深情的笔触,展现了家山河壮美与辽阔,时节变迁与更替以及此间感悟与思考。师存保的《洗耳河情思》,通过洗耳河的潺潺流水,诉说着故园的情深意长,相忆的真挚与感动,往事的如烟如梦。岳晋峰的《家在三门》,以黄河岸边的老家三门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和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展现了时代的浪潮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孙宏恩的《河畔乡音》,则忠实记录了家乡的传说故事和民俗乡风,深入研究了地方

特色文化,让读者感受到了乡土文化的魅力与深厚底蕴。何敬民的《鸣条渚水情》,扎根运城盐湖一带,用文字记录着家乡的地理沿革、历史变迁和民俗探源,让读者领略到了河东大地的历史厚重与文脉渊源。

“河东文丛”不仅是对河东地区的描绘与记录,更是对人性、对生命、对时代的深刻思考与探索。它们触及人心的最深处,引发读者对生活、对爱情、对亲情、对友情、对故乡、对祖国的无限感慨与思考。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用文字刻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痕迹和声音将会留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这个时代、感受我们这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一个窗口。

老凹先生谈书法,并不从技法细节展开,而是把问题落在“人”本身:人品与学养,决定作品的上限。在他看来,笔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楠 美编 肖秉阳

谈艺录

清明假期,在运城停了半日,应老友、书法家老凹(卫牟娃)先生之约,参与了“河东八友”的一场聚会。

多年前在永济挂职时,我就听人提起过“八友”名号。这次真正坐下来相处了解,才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可贵。他们并不依附于其他正式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安排。彼此间的联系,更像是一种慢慢形成的默契:谁有新作,便拿出来相互看一看、评一评;谁遇到困惑,就在饭桌或茶间反复聊一聊。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往来:不算密集,却从未中断;不刻意安排,却始终在场。内部建立起审美判断与人格认同之上的默契,大致知道彼此的取向和边界,交流因此不至于流于应酬,也无需借助外在规则来维系。

“河东八友”,按年龄长幼,分别为张英俊、谢良虎、卫牟娃、赵玉汉、潘和平、杨明珠、仇官有、杨琦。他们在不同岗位,有人从政,有人从事群众文化或教育工作。前后算来,已经十余年了。

众人席间谈工作,也谈身体,再到各自正在写什么、画什么,偶尔也会提到展览与外界评价。说到身体,也不只是寒暄,而是与创作密切相关——精力、耐力、视力,甚至握笔的稳定度,等等。饭后我们步行到张英俊先生的画室。张先生已年过八旬,走路依然稳健而自在。他的画室里,新旧作品并置,案头几本书籍摊开,角落里堆着未装裱的画卷。

茶水续了几轮,话题自然转入书画见解。

张英俊先生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少年家境清贫,学业一度中断,但靠着后来的苦读,一点点把基础补了回来。长期从事文博工作,使他得以系统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从器物到文献,从历史脉络到精神内核。这种长期浸润,慢慢沉淀为他的文化底色,也成为其艺术实践的重要支撑。他提到“绘事后素”,强调内心的澄明与充实,最终会体现在作品的气象之中。

谢良虎先生说自己的艺术起点,来自中国民间美术的坚实土壤。早年接触剪纸、花馍、年节对联,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经验,构成了他对“美”的最初理解。他强调“物情物意”,认为物象只是媒介,关键在于承载情感与趣味。他将中国戏曲绘画等传统艺术的核心概括为“写意”,强调对物象加以转化超越,使之进入更有精神意味的表达层面。

老凹先生谈书法,并不从技法细节展开,而是把问题落在“人”本身:人品与学养,决定作品的上限。在他看来,笔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

便已出现悟空、八戒的经典形象;宙宇将儒释道诸神形象生动塑造。从明代工匠的匠心刀笔,到如今游戏的光影呈现,山西早已积蓄了上千年的文化能量,静待一朝绽放。”任毅敏说。

任毅敏是平陆人,多年深耕文物与古建研究。讲到与家乡文物的缘分,他颇为感慨:自己家距离永乐宫不过几十里路,年少时却不知国宝就在身边。走上工作岗位后,他才真正体会到山西古建的震撼与珍贵,也更加意识到,本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是传承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带着这份初心,他办了一场讲座,变成了一次面向大众的古建普及课。

讲座不仅讲古建之美,更讲保护之道。任毅敏介绍,山西古建保护始终坚持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原则,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科学修缮,让古建真正实现活态传承。他现场讲授时还将古建历史、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红色文化、晋商精神、革命遗存相结合,让整场讲座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温度。

走出展厅,观众意犹未尽。大家表示,这场讲座内容扎实、讲解生动,从唐构木建到明清彩塑,从壁画艺术到营造技艺,从保护理念到文化传承,让人感受到“地上五千年看山西”的分量,也更加理解了文物保护的意义。

同道相契,斯文在兹

——与“河东八友”雅聚有记

■袁晓阳

的,而是人的精神、气质与见识的外在显现。他提到黄庭坚“学问文章之于笔墨之间”,也说到林散之晚年的体会,认为书法终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长期修养中慢慢“养”出来的——“写字者,写志也”。

赵玉汉先生早年从事音乐、戏剧及群众文化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对节奏、结构以及整体气息有着敏锐感受。这种跨门类的经验,为他后来转向书法并提供了基础,使其在处理章法与行气时,往往更强调调整的节奏,而不至于停留在笔画层面。

潘和平先生长期在政务体系中工作,对社会运行有着切身的理解。在事务繁忙之中,他始终保持对笔墨的持续投入,使书法成为其维系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

杨明珠先生的书法实践,建立在对传统书学体系的整体理解之上。他将书法视为连接文学、美学乃至人格修养的一条路径,强调“学养滋养书法”,认为基础无法速成,只能在时间中慢慢生成。他用“土肥与化肥”作比喻,指出速成虽见效快,却难以持久,同时强调“临是临他人的,写是写自己的”,主张在传统法度与个体表达之间找到平衡。

仇官有先生强调进入系统性的法帖学习,以“二王”以及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为基本路径,通过不断深入经典,建立对书法整体结构的理解。他提出“书法要实实在在地写”,将笔法视为核心,并通过对起笔、行笔、收笔的整体把握,使技法转化为节奏与气息的统一。

在艺术观念上,杨琦先生更强调“内在蒙养”。他认为书画的根本,在于人的整体修养,而非单一技巧,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应当保持警惕。他同时将对书法视为一种公共事务,强调责任与协作,在个体修行与群体发展之间,力求形成相互支撑。

八个人,路径各异,起点不同,所处环境也不相同。但细聊下来,在一些更深层的判断上,他们却是相通的:更看重根基,而不是形式;更相信时间,而不是速度;也更在意内在修养,而非外在呈现。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这个看似松散的群体,才维持着某种内在的一致。

我想,在什么都讲究“快”和“有用”的今天,还有这样几个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慢慢养出一种不必多言的默契。不喧哗,也不急于求成,只是偶尔聚一聚,看看彼此的新作,说几句笔墨,然后各自回去,继续写,继续画。这大概就是“同道相契”最朴素和最美的样子。

河东地域文化纵览

美公忠义文化